

略談「公共型」的知識份子

張永輝

面對一個封閉壓迫性的社會，知識份子的反抗義務不會比一般公民少，可是也不會多於一般公民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懷疑所謂「有機知識份子」的特殊地位。在漢語世界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，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。這個理想，由於關係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、民主化，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體制的改革、或者是民主的鞏固。

在一篇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裏，張灝先生談到了知識份子的類型問題。他認為，在大家較熟知的、葛蘭西 (Antonio Gramsci) 所提出的「傳統型」與「有機型」知識份子之外，還應該分出一種「公共型」的知識份子。確實，「公共型」知識份子的概念，近年來時見使用 (特別是在美國)。雖然這個概念的來源與精確意義不容易考訂，不過它似乎確實帶出了知識份子的某些特質，值得我們思索。



近代政治思想所謂的「公共」，指的乃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形態，特色在於其間既充滿差異、而又必須藉非權威的方式求取共識。讓我們對這個說法做一點概念分析。「差異」指的是利益、認知、身份與信念、價值觀各方面的差異；一群人如果相互沒有差異可言，那是一種同質統一的狀態，稱之為有機的共同體可以，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。「共識」指的是能夠接受經營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規範與權利、義務關係；人們如果不求取共識，無異是說他們沒有共存合作的需要，這樣的一群人稱為偶然的萍聚可以，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。所謂「非權威」的方式，指的是這種「接受」缺乏一個先在的目的或者價值標準，足以提供無庸爭議的理由；如果共識可以由權威的方式達成，那表示權威之所以為權威，在先已經有了共識；這種團體具有其他的特定屬性或者特定目的，卻無足以構成公共生活。關於「公共」這個概念，我們都有一些直覺的理解。稍事反思，我們會發現，這些理解都預設了「差異」與「非權威的共識」這兩個側面。

公共生活的這兩個側面，乃是現代知識份子得以取得形貌與角色的社會基

礎。在今天，知識份子的特色，當然不會在於他的知識、專業技能或者職業分類。在學者、專業人士、官僚、作家等等身份之外，需要另立一個「知識份子」的範疇，說明了直覺上知識份子是有其特質的。或許我們可以證明，這種特質，正是「公共」這個概念所企圖捕捉、表達的。

知識份子的特質，大抵有兩方面。其一，知識份子理應以寬容開放的說理與溝通來探討議題；這意思是說，知識份子探討議題的時候，不能訴諸人格、身份、學術、專業、傳統、信念等等權威。這種以說理途徑處理議題、卻不能訴諸特定領域之權威的情況，乃是公共領域的特色；抹殺這種特色，我們就離開了公共領域，回到了教室、工廠、軍營、董事會或者教堂。當然，這不是說公共的說理毫無依據可言；經驗與邏輯都有遵循參考的必要，可是它們不是足以判定正當與否的權威。這個說理概念，羅爾斯(John Rawls)曾經以「公共理性」名之。

其二，所謂沒有可以直接訴求援引的權威，意思不啻是說，進行公共說理的時候，不能不對所面對的權威有所質疑和反思。為了貫徹公共的說理與溝通，知識份子不得不以懷疑與反思的態度，面對現存的事實、規範與價值觀。換個方式說，現存的共識，本身對於公共性便構成了潛在的威脅，因為這種共識可能絕對化，成為拒絕接受說理考驗的權威，也就是成為阻礙公共生活的因素。

以上所言，顯示知識份子的特質，在於以開放而平等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說理。這種開放與平等，當然不是單純的道德理想所能產生，而是反映了現代社會裏「藉非權威的方式在差異之間形成共識」的結構性的基本需要。這種需要，促使公共型的知識份子扮演他們的角色。如果他們充分發揮了這個角色，社會議題就能獲得比較開放而合理的陳述，也為社會提供了較多的說理與討論的資源。對社會的民主生活，這可能是知識份子所能做的較大貢獻。

這裏有兩個明顯的問題。第一，如果社會還不允許差異存在、不容許非權威的方式形成共識，知識份子該怎麼辦？我想，除了協助差異性的論述出現、協助非權威性的說理方式出現之外，並沒有甚麼事是一定需要知識份子做的。換言之，面對一個封閉壓迫性的社會，知識份子的反抗義務不會比一般公民少，可是也不會多於一般公民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懷疑所謂「有機知識份子」的特殊地位。問題在於，由於知識份子的職業本能是進行開放的說理和對權威的質疑，往往他們會與壓制勢力直接衝突。權威與反權威的衝突，最後演變成道統與政統的衝突。身為道統的承載者，知識份子會取得道德的地位，一則形成保護傘，再則也維繫、號召一般人的反抗意識。就後一點而言，知識份子成為「傳統型」知識份子，往往被視為社會良知，是有道理的。

這就聯繫到了第二個問題：知識份子自己是否願意接受差異、接受非權威的共識之路，作為社會公共生活的準繩？以我個人的有限經驗來觀察，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，在這個問題上的警覺與自惕還不夠。不夠的基本原因在於，漢語世界一般而言，社會分化程度與寬容異己的程度都較為有限。不夠的徵候很多，其中之一是喜好用道德語言進行公共論述，另一就是喜好用學術權威干預公共討論。

用黑白善惡的語彙描述社會現象、區分不同的立場雖然是人情之常，卻也是知識份子應該避免的廉價武器。這不是說我們可能放棄道德觀點，而是說在從事

公共性的論述說理之時，以普遍與平等為念的道德要求，應該節制發自實質價值信仰的道德裁判、發自道德優越感的譴責和傲慢。前者維持了公平與平等，後者則注定會傷害公共領域的差異與共識原則。道德優越感如果進一步蔓延，僭稱自己為清流、為社會良知所在，認為自己所支持的立場站在正義的一方，他人則甘於沉淪、甘為鷹犬，自然就更有藉道德口實裹脅公共論述的危險。

另一方面，學術知識應該只是公共說理時運用的資源，而不應該(韋伯[Max Weber]會說不可能)成為社會做決定時依循的權威。知識份子追求學術獨立不遺餘力，卻往往會忘記學術還有維持中立的必要。「學術獨立」是為了保障學術領域的自主，「學術中立」則是為了保護其他領域——尤其是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共領域——的自主，不要讓學術權威干擾了其他領域的運作邏輯，尤其是公共領域中平等說理的規範。這個道理，當年韋伯曾經致意再三。不過，這種激進的多元論的意義，在一個結構性的分化還不算很深的社會、文化環境裏，可能是不容易體會的。

知識份子一本公民本分，進入公共領域發揮他們的說理本業與文化素養，為公共論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資源與說理典範，構成了公共型知識份子。如果以上的觀察不算無的放矢，那麼在漢語世界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，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。這個理想，由於關係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、民主化，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體制的改革、或者是民主的鞏固。在今天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幾乎是唯一一份有心照顧整個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刊物，用以上的一點反省紀念這份刊物十年的努力，或許也有前瞻的意義吧。

錢永祥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全球化與化全球



今天，科技與經濟的條件已使地球宛如一座山村了，在經濟方面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了，也就是所謂全球化了，但這便是大同世界麼？作為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，對於眼前的全球化，頭腦必須清楚，切勿自作多情。

全球化的浪潮洶湧澎湃。不光是經濟的全球化，還有政治的全球化、文化的全球化，劈頭蓋臉地到處都在化，大有挾其雷霆萬鈞吞噬一切的架勢。

到底甚麼叫做全球化？報刊上已有許多嚴謹的、周密的、學院式的定義和